

取消或重新佈署

——林新惠《瑕疵人型》與《零觸碰親密》中的 情感擬真與身體代理

李恩齊

陽明交通大學博雅書苑助理研究員

摘要

本文聚焦林新惠《瑕疵人型》（2020）與《零觸碰親密》（2023），探討當代台灣科幻如何以「情感擬真」與「身體代理」重寫親密與性別邊界。《零觸碰親密》將後疫情的「無觸」建構成親密技術的「正當」來源，觸覺被安全語彙與介面規訓取代；《瑕疵人型》以「可修復的機械身體」諷刺情感連結的折舊與可替換性。兩小說中的 AI 被女性化並可隨人類意志重新佈署的位置，從而揭露人類情感早已在技術與資本的框架內運作。本文以海爾斯（N. Katherine Hayles）的後人類身體概念、哈洛威（Donna J. Haraway）的賽博格及部分視角與布拉伊多蒂（Rosi Braidotti）的後人類倫理進行辯證，透過小說細讀分析、敘事視角，展現「延遲、斷線、瑕疵」等微小失配正是 AI 時代的人／機倫理被迫現身的場域。本研究主張林新惠的小說開啟台灣科幻小說的 AI 新時代特色：以往科幻小說探討機器能否「像人那樣感受」以及「科技是否會反撲的問題」，林新惠則轉而探問人類情感本身的物質性與商品化如何與科技交融產生主體邊界的位移，並嘗試跨域進行科技與文學的對話，探索小說中思考的近未來景象：在技術失配留下的縫隙裡，人類無法被預知的「瑕疵」如何成為回應的起點。

關鍵詞：台灣科幻小說、情感擬真、身體代理、無觸親密、後人類倫理

Cancellation or Redeployment:

Affective Simulation and Somatic Agency in Lin Xinhui's *Human Glitches* and *Contactless Intimacy*

Li En-Qi

Assistant Research Fellow
Liberal Arts College
National Yang Ming Chiao Tu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how contemporary Taiwanese science fiction rewrites the boundaries of intimacy and gender through “affective simulation” and “somatic agency,” focusing on Lin Xinhui’s *Human Glitches* (2020) and *Contactless Intimacy* (2023). In *Contactless Intimacy*, the post-pandemic condition of “zero-touch” is constructed as a legitimate mode of technologized intimacy, in which tactile experience is displaced by safety discourse and interface discipline. In *Human Glitches*, the “repairable mechanical body” satirizes affective bonds as depreciable and replaceable assets. In both novels, AI figures are feminized and rendered redeployable at human will, revealing that human affect has long operated within the frameworks of technology and capital. Drawing on N. Katherine Hayles’s theorization of posthuman embodiment, Donna J. Haraway’s cyborg figuration and situated knowledges, and Rosi Braidotti’s posthuman ethic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novels’ human-machine intimacy narratives through close reading. It argues that micro-scale mismatches — delay, disconnection, and defect — constitute the very sites at which human-machine ethics are compelled to emerge in the AI era. This study further contends that Lin Xinhui’s fiction inaugurates a new phase of AI-oriented Taiwanese science fiction: whereas earlier science fiction asked whether machines could “feel like humans,” Lin Xinhui shifts the inquiry to how the

materiality and commodification of human affect become entangled with technology, displacing the boundaries of subjectivity. Ultimately, this article proposes that the unpredictable human “glitch,” lodged in the interstices of technological mismatch, becomes the point of departure for ethical response and answerability.

Keywords: Taiwanese Science Fiction, Affective Simulation, Somatic Agency, Contactless Intimacy, Posthuman Ethics





一、前言

學界自 90 年代海爾斯的《我們如何成為後人類》（*How We Became Posthuman*）¹ 開啟後人類思潮。陳國偉指出台灣科幻小說關於後人類的實踐其實早於翻譯的引入，² 至於學術研究脈絡，廖朝陽於 2007 年在《中外文學》發表的〈失能、控御與全球風險：《功夫》的後人類表述〉，³ 則被視為開啟台灣此一研究脈絡的重要起點。哈洛威的賽博格理論則為女性主義提供了新的切入點，⁴ 以「邊界鬆動」做為想像的引擎，自然與文化、人與機器、男性與女性的二分界線開始鬆動，即林建光所言，她所提出的是一種保留裂縫、部分性與碎片性的主體形構，其特徵並非整全一致，而是在碎裂之間仍保有彼此串連的生成可能。⁵ 直至 2025 年的當下，在生成式人工智慧進入生活世界後，人類面對想像的烏托邦逐漸實現科幻「成真」的可能，亦成為當代制度與倫理的巨大衝擊；當人機協同的主體樣態逐漸成形，人類對自身何以為人所產生的焦慮反而達到高點。本文認為林新惠的科幻小說將讀者置於「近未來」、人機主體命題呈現反轉的臨界位置：當人工智慧發展出自我學習的里程碑，人類如何維持自身的獨特性以自證為人？

從海爾斯開始，技術與生命的界線便被重新書寫，她認為「人」不再是肉身的中心，而是資訊流的節點，是由語言、數據與意識共同編碼的結果。⁶ 哈洛威在 1985 年在《社會評論》上發表〈賽博格宣言〉⁷ 則以賽博格的隱喻顛覆自然與文化、男性與女性、機器與有機體的二元對立，提出一種後人類女性主義的政治想像；其論述的賽博格不再是冷冰冰的機械裝置，而是一種混融的存在，一個在界線模糊處生長的主體。本文認為，進入人工智慧（AI）全面滲透的時代後，

1 N. Katherine Hayles, *How We Became Posthuman: Virtual Bodies in Cybernetics, Literature, and Informatic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 pp. 2-4.

2 陳國偉，《類型風景：戰後台灣大眾文學》（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3.11），頁 171。

3 廖朝陽，〈失能、控御與全球風險：《功夫》的後人類表述〉，《中外文學》36 卷 1 期（2007.03），頁 19-66。

4 Donna J. Haraway, *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Routledge, 1991.

5 林建光、李育霖主編，《賽博格與後人類主義》（台中：中興大學出版中心；新北：華藝學術出版，2013.12），頁 2-3。

6 同註 1。

7 Donna J. Haraway, "A Manifesto for Cyborgs: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alist Feminism in the 1980s." *Socialist Review*, no. 80, 1985, pp. 65-108.

這種混融不再只是一種符號或隱喻，隨著生成式 AI、情感計算與腦機介面技術（Brain-Computer Interface, BCI）的發展，科幻的想像已逐漸成為可經驗的現實。哈洛威所構想的「賽博格解放」，亦即人與機器之間的界線消融，如今轉化為另一種倫理困境：當 AI 不只是工具，而是滲入感知、語言與情感結構的「共生他者」，能模仿思考、生成情感、甚至取代創造，人類該如何再確認自身的主體性？因而人類除了面對「能否控制技術」的問題，更逼近的是「當技術能模仿我們時，何以為人」的問題。海爾斯提出「人類成為後人類」的過程是一種「自我消解的轉化」，而在 AI 時代，其所謂的消解已從理論預測成為日常經驗的真實；當聊天機器人生成的語言愈來愈像人類、當深度學習系統能夠理解情緒、當虛擬陪伴取代真實親密關係，人類發現自己正站在「近未來」的臨界點上：人類作為主體的地位產生了位移。林新惠的科幻小說成為檢驗這個臨界點的思想實驗之一，以敘事形式想像技術的可能，更以美學的方式重構「成為人」的條件。是故，本文以林新惠的小說短篇集《瑕疵人型》⁸ 當中的科幻文本與長篇《零觸碰親密》⁹ 為分析對象，展開 AI 時代人機主體生成的對話與恐懼。本文認為其小說的世界並非純然的未來幻想，而是人類站在 AI「近未來」的邊界之際，既真實又陌生的現實延伸空間：在此空間，人工智能的完美邏輯與人類的 imperfect 情感彼此糾纏，形成一種新型態的親密政治。值得注意的是林新惠小說中的 AI 超出了純粹的外在「他者」的位置，而同時是人類映照的鏡面：AI 的「完美」反而讓人類的「缺陷」成為獨特的辨識。人類不再因理性或靈魂而自證為人，而是因為瑕疵（bug）、延遲、情緒失控這些「非效率」而被辨識為人。然而，在追求擬人與代理的科技進步時代，人類必須因瑕疵而自證為人的倫理意義是什麼？林新惠的小說便呈現此種反轉的存在邏輯，亦即：人類藉由科技仿若達到完美之後，反而迷失了自我的主體性。因此，本文主張「以瑕疵自證為人」的倫理想象，挑戰了 AI 時代對效率、完美與可預測性的信仰。林新惠的 AI 敘事除了投射人類對科技的恐懼：當 AI 能生成詩、描繪情感、甚至模仿愛，人類的「獨特性」如何成立與證明？

8 林新惠，《瑕疵人型》（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2020.05）。

9 林新惠，《零觸碰親密》（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2023.05）。

若人與機器之間的界線在情感與認知層面皆被瓦解，人類該如何重新定義倫理、責任與關係？林新惠的小說揭示一種新的「後人類倫理學」，在 AI 科技似乎即將實現的「近未來當下」，裂縫與不確定性反而成為人類的獨特所在。

因此，本文認為林新惠的小說敘事重新書寫了「人」處於 AI 時代中的定義：人之所以為人，其能夠思考或創造的獨特性被 AI 消融，反而在於瑕疵迸發時的不可預測性、猶疑與感受的時刻湧現與 AI 的差異。本文以此視角與海爾斯、哈洛威、以及布拉伊多蒂所提出的後人類「生成性」(becoming) 進行對話與辯證。因此，本文的問題意識並非從新世代科幻小說探討「AI 能否取代人」，而是進一步追問「當人機交融成為日常，何以為人？」小說中，AI 具備了雙重特質：既是外部威脅，亦是迫使人類重新反思自我定義的鏡面；他者的到來使人類看見自身的侷限，同時亦開啟了 AI 科技倫理的可能。而小說中主角對真人碰觸的需求之為「bug」超越了技術瑕疵，成為存在的徵候，讓人類從完美的幻象中清醒，回到做為有限存在的謙卑狀態，依布拉伊多蒂所論，後人類主體並非抽離世界的自足意識，而是「具身與嵌入」的存在，因而只能承擔局部性的責任；此責任以集體性與關係性為基礎，導向社群建構與共生協作。¹⁰ 小說中人類因錯誤、延遲、情緒起伏而顯露的脆弱反而顯影主體被關係牽繫的事實；人以瑕疵自證，自我的純粹封閉性流動開放為人機與人際連結中所承擔的、不可替代的責任。

綜上，本文以林新惠《瑕疵人型》與《零觸碰親密》為例，透過文本細讀分析其人機親密敘事，援用海爾斯與哈洛威的後人類理論探討「瑕疵」與「完美」之間的辯證，並進一步與布拉伊多蒂的後人類倫理進行對話，揭示人機親密的近未來敘事的不同面向：其一，人類以不完美顯影具身與嵌入，據以承擔局部性責任。¹¹ 其二，技術中介是主體生成的條件，需要以動態的轉化倫理加以節制，抵抗烏托邦與懷舊的雙重誘惑。¹² 其三，橫貫性視角可提供人類重構自然文化連續體中的親屬與責任鏈，並在將視野推進到生命政治與人文學科位移的層次。¹³ 本

10 Rosi Braidotti, *The Posthuman*. Polity Press, 2013, pp. 49, 191.

11 同註 10, p. 49.

12 同註 10, p. 90.

13 同註 10, pp. 95, 103, 128-129, 145.

文的研究貢獻由此確立：在人類對科技具烏托邦特質的想像下，科幻小說如何反映人在科技時代自我辨識的焦慮、在關係網絡中承擔何種責任，又如何成為實踐後人類倫理的場域。尤其進入 AI 時代，科幻小說所揭示的「人性」已非不變的本質，而是呈現不斷生成的倫理姿態：人之為人，不在於能發明、使用科技以趨近完美，而在於能與科技共居於不確定之中。

二、相關研究探討

邱正祥的研究〈林新惠《零觸碰親密》的賽伯格問題〉¹⁴ 探討林新惠《零觸碰親密》中賽伯格主體的倫理命題，他指出哈洛威的賽伯格象徵人與機器、自然與文化的界線鬆動，而布拉伊多蒂將此鬆動延展為「生成」的倫理動能，使主體在與非人共構的網絡中不斷重生。然而，邱文的詮釋側重於在反烏托邦語境中揭示「生成」作為整體性流動所隱含的 AI 政府生命政治邏輯，聚焦於人類數據化與科技支配的批判面向。本文在承接此一批判視角的前提下，進一步補充邱文較少論及的倫理維度，亦即生成過程中必然存在的失效、延遲與錯誤的倫理價值；本文分析林新惠小說中的生成如何以裂縫為條件開展其倫理意涵，與邱文的反烏托邦批判形成互補性的理論對話。此外，邱文指出小說中的「人機配種」不僅未能如哈洛威所願打破性別二元，反而鞏固了異性戀父權結構，將轉換義體的女性重新鎖死於私領域的無償情感勞動中。這一性別政治的批判，直接呼應本文關注的「情感擬真與身體代理」議題，顯示演算法治理如何將性別差異轉碼為新形態的系統性壓迫。本文在討論《零觸碰親密》時，將回應此一性別批判向度，分析「支配的資訊學」如何精緻地將性別與無償情感勞動嵌入技術治理之中。進一步而言，邱文認為小說中的「零觸碰」雖然來自於科技設定，更深層的是象徵親密關係的去倫理化，同時援引梅洛龐蒂（Merleau-Ponty）與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理論指出觸覺乃倫理的在場形式，唯有「被觸及」與「能觸及」的相互可感性，才能構成人與他者的倫理關係。值得注意的是，邱文以梅洛龐蒂的觸覺社會性與馬蘇米（Brian Massumi）的情動理論界定了 AI 模擬表徵與人類「不

14 邱正祥，〈林新惠《零觸碰親密》的賽伯格問題〉，《文學新論》40 期（2024.12），頁 61-79。

可化約之強度」間的界線，此觀點與本文強調「延遲與回應」的具身時間性相互呼應，可做為本文互補性的理論對話。本文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論述此界線，將「觸覺」詮釋為回應性與延遲之倫理結構；亦即，AI的問題並非「不可觸」，而在於「無法延遲」導致失去了情感在生成過程中產生回應的間隙，此延遲的消失亦是「之間的消失」，是林新惠小說最具啟發性的倫理核心。此外，邱文援引馬蘇米的「情動半秒差距」說明AI模擬情感的侷限，即機器能再現情感表現，卻無法經驗情感生成的瞬間。本文認為此觀點雖揭示了AI情感的結構性缺席，卻仍未提出具體的判斷準則：情感的「存在」如何得以被經驗？麥肯齊曾提出當代技術在速度與訊號流的層次上與身體、知覺與社會關係相互糾纏。¹⁵他批判「科技讓一切加速」，主張我們面對的不是單一的加速，而是多重、異質的「速度差」與延遲結構；技術實踐總是透過各種轉換機制（transduction）過程，把能量、訊號與身體感受轉換成彼此可互通的形式，因此「技術」與「身體」、「社會」從一開始就不是分離的實體，而是由轉換機制關係構成的場域：首先，所謂「即時回應」其實建立在龐大的技術基礎設施與訊號路由之上，任何微故障（glitch）、延遲（lag）或觸碰失效，都暴露出這套情感擬真系統背後的技术時間。其次，「技術具身化」與「設備個體化」的論述，啟發本文零觸碰親密、機器身體與照護介面視為一組轉換機制；亦即情緒是在感測器、演算法、網路延遲與身體反應之間來回被轉寫。綜合而言，麥肯齊雖未處理「情感擬真／情感聚現」的二分，但其關於轉換機制、速度差與技術具身化的分析，啟發本文在後人類親密做為一個由多重技術時間與身體關係構成的網絡前提下，更精細閱讀小說中情感擬真如何在性別與權力配置中被部署與抵抗。

有關「人機互動之情感識別」（Emotion Recognition for Human-Robot Interaction）之研究，主要以心理計算與人工智能感測技術為基礎，觀察機器能以生理訊號、面部表情與語音參數如何推估人類情緒，如凱索斯等人的研究，假設情感為可測量、可分類、可預測的資訊輸出，進而形成「可被辨識的情緒」的

15 Adrian Mackenzie, "Introduction." & "Infrastructure and individuation: speed and delay in Stelare's Ping Body." *Transductions: Bodies and Machines at Speed*. Continuum, 2002, pp. 1-5, 122-123.

實體。從後人類倫理的觀點來看，該技術路線所構築的並非情感之「存在」，而是擬真倫理的構建，以演算法取代情感生成的延遲，將回應轉化為即時輸出，從而抹除了情感作為關係事件的時間性，該主張認為情緒並非可透過單一表徵辨識，而是一種跨模態的具身事件。¹⁶ 研究者整合臉部表情、聲音與身體動作三種訊號，並以三模態語料庫比較情緒辨識的準確度，結果顯示單一模態的表情或語音皆呈現明顯限制，而手勢動態因能呈現情緒的強度與節奏，反而具有較高辨識率。當三種訊號合併後，辨識效果顯著提升。更重要的是，其分析指出情緒的區辨來自「動態特徵」包含速度變化、峰值時序與能量分布等時間性資訊，而非靜態表情本身。此結果彰顯情緒的時間性與具身性，並顯示情緒表達建立在多通道的身體脈動之上。此類研究促進本文跨領域的反思情感擬真之實證基礎：即便是高度工程化的模型，仍須依賴具身動態訊號才能接近情緒的外在表現，然而現行 AI 系統所運算的情緒多侷限於臉部與語音的可計算表徵，缺乏身體回應與延遲性的生成過程。因此，AI 的「情感輸出」更接近擬真演算，而非具身存在，亦不足以觸及情感關係的倫理維度。

根據馬蘇米的論述，情感（affect）之所以具有自主性，在於它總是從具體身體與認知框架的收編中不斷逃逸，情緒只是該捕捉的最收縮表現，同時也顯示總有某種未被實現、不可還原為功能化視角的剩餘存在。¹⁷ 因此，情感的力量並非來自已被分類與固定的表徵，而是在於持續逃逸的未定形生成狀態。艾哈邁德（2004）的研究更進一步指出，主體在與他者遇合（encounter）前固然具有身體感，但身體在注意的流向中往往被暫時遮蔽，唯有在與他者的情感遭遇中才重新顯現為感知表面。¹⁸ 換言之，情感不僅重新定向主體與對象的關係，也重新召喚被「日常透明化」的身體，使情感成為一種關係性的再定位過程，而非內在狀態的外洩或可量化的心理事件。綜言之，情感辨識技術所捕捉的只是被壓縮為訊號與標籤的「情緒效果」，而非在逃逸、延遲與遇合之中生成的情感聚現。因此本

16 Loic Kessous, Ginevra Castellano, and George Caridakis, "Multimodal Emotion Recognition in Speech-Based Interaction Using Facial Expression, Body Gesture and Acoustic Analysis." *Journal on Multimodal User Interfaces*, vol. 3, no. 1-2, 2010, pp. 3-48. <https://doi.org/10.1007/s12193-009-0025-5>.

17 Brian Massumi, *Parables for the Virtual: Movement, Affect, Sensati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35.

18 Sara Ahmed,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Emotion*.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26.

文人機互動中情感擬真的討論，將回到具身時間性與關係再定位的層次，重新思考 AI 在親密與照護情境中究竟能夠「感知」什麼，又無法取代什麼。

〈從擬真到擬人：生成式 AI 如何重塑數位分身技術〉¹⁹ 以技術系譜分析數位「分身」從「數位模型／數位孿生」進展至「智慧分身／擬人分身」，並以生成式 AI（GAN、Transformer、擴散模型）與代理協作為關鍵驅力，主張「分身」正取得語言理解、情境推論與情感互動等「類人」能力，進而提出語意孿生與「分身即服務」的世界。此路線界定了從可視化到可對話、從單體到社會化代理的科技變革，可幫助本文論析近未來人機親密的背景脈絡。然而，該文的前提仍需檢證：首先把情感與人格預設為可被辨識、模擬、替換的資訊結構，將情感互動等同於表徵與反應的精確度，無法處理前反思層次的感知及動作耦合與「可被他者感知的回應延遲」。其次是把記憶設計為可重置與可優化的模組，削弱了倫理所仰賴的不可逆性（承諾、悔恨、傷痕的時間厚度），使「社會適切」流於績效層面。再次則是其「情感識別」體系以一致性與可預測性作為擬人成功的主要指標，實際上粗暴的確立了外觀即內在的推論：認為身體表徵能直接指向內在情感狀態，將感性轉化為可運算性，把「感受到的親密」誤認為「可承擔的關係」。本研究則可補足以上邏輯跳躍處：首先以「擬真情感／情感聚現」區分作為基本界線，僅有引發身體習慣變化與關係位移的互動才具倫理意義。第二，論證「可回應的延遲」乃為主體能動性的基本條件，將即時、無遲滯的高精確度對答界定為語法庫可預測的對應重組。最後，以「不可被任意模組替換」檢驗人格的連續性與當責性，其技術邏輯與林新惠小說中的 AI 角色形成對照。當 AI 能以高準確率辨識人類表情，卻無法生成情感的遲疑與轉化，其完美性反而暴露為倫理的匱乏。亦再次印證，AI 情感識別系統僅複製「可觀察行為」的外在意向，而非真正具備「我能感受」的感知迴路。其「回應」是一種模擬，而非生成。

在人工智能倫理與社交機器人研究領域，〈社交互動機器人的情緒智能與記

19 周世俊、王榮陸，〈從擬真到擬人：生成式 AI 如何重塑數位分身技術〉，《電工通訊季刊》2025 第 2 季（2025.06），頁 27-34。

憶架構整合)²⁰ 嘗試將「情感智商」(Emotional Intelligence, EI) 理論與長短期記憶(LSTM) 架構結合, 模擬人類在情境中的情緒調節與社會回應。該研究主張, 透過將記憶模組與情緒權重結合, 機器可在互動中「學習」如何回應他者的情感, 從而生成具社會性的行動。此技術進路看似實現了人工情感的動態化, 但其倫理假設依然建立於可演算法化的理性、情感整合之上, 延續「完美代理」(perfect agent) 的理想。就理論而言, 此類 AI 架構企圖以「情感的資訊處理」取代「情感的具身生成」, 亦即將道德行為的可預測性與穩定性視為倫理價值本身。然而, 本文認為能動性源於具身延遲與關係回應的脈絡依附, 而非計算後的最佳產出。亦即, AI 若以數據模型模擬「共感」的行為, 卻無法體驗共感的身體負荷與情緒變化, 其「情感智商」遂淪為演算法的影像。其研究雖提出「情感記憶」可作為長期學習的基礎, 但這種記憶被設計為可回溯、可重置、可優化的結構, 缺乏倫理在時間性上的「不可逆性」。正如布拉伊多蒂所言, 後人類主體是一種具身且嵌入的存在, 其責任感來自這種始終部分的、有限的處境。²¹ 此主體並非可被清空或重置的意識, 而是受記憶、情動與關係所牽引的生成過程。²² 因此, 倫理並非抽離(具身)的普遍原則, 而是在身體歷史與關係回應性之中被承擔。AI 的「記憶架構」卻消除了此一負荷, 使其能動性雖被擬真, 卻失去責任的時間厚度。本文認為此研究的技術成就與理論預設共同構成一種「擬真能動性的幻象」, 以完美的回應模擬取代不完美的倫理生成, 將情感記憶視為優化回路, 而非傷痕與歷史的累積。本文將以此為反例, 探索林新惠小說中的 AI 主體如何以「無法重置」的情感裂痕顯影其人性殘餘以及無法抹除的倫理軌跡。

漢彌頓(Grant Hamilton) 與劉(Carolyn Lau) 所編輯的《後人類系譜》²³ 為當代後人類研究的重要論集, 首先從知識論與歷史脈絡鬆動「人」的既定形象。書中導言指出, 通俗論述常將後人類誤解為「當人類超越生物性」的科技未來,

20 Fuze Sun, Lingyu Li, Shixiangyue Meng, Xiaoming Teng, Terry R. Payne and Paul craig, "Integrating Emotional Intelligence, Memory Architecture, and Gestures to Achieve Empathetic Humanoid Robot Interaction in an Educational Setting." *Frontiers in Robotics and AI*, vol. 12, 2025. <https://doi.org/10.3389/frobt.2025.1635419>.

21 Rosi Braidotti, *The posthuman*, p. 49.

22 同註 21, pp. 81-83.

23 Grant Hamilton and Carolyn Lau, editors. *Mapping the Posthuman*, Routledge, 2023, pp. 1-16.

但後人類並非宣告人的終結，而是宣告某種特定人文主義模型的終結，亦即將「人」視為知識場域中唯一的衡量尺度與價值中心。在其詮釋框架下，後人類思考旨在揭露人文主義中被自然化的排除機制，並在科幻敘事與「近未來神話」的想像中，嘗試重構人與非人、科技與生命之間的關係，提出多物種共存與另類現代性等可能。然而，書中相關研究對於演算法與數位技術的批判主要停留在宏觀層次，多聚焦於科學客觀性神話與演算法如何再製種族與階級不平等等問題。對本文關注的情感擬真與人機親密互動議題，《後人類系譜》提供一套知識論與倫理框架，用以拒絕把「人」視為自足主體並提醒虛擬實踐始終繫於具身與物質條件；但其討論較少觸及微觀層次的情感生成、親密感受與身體回應的時間性。因此，本文在承接其對人文主義與技術客觀性的批判前提之後，將進一步分析具身情感與關係倫理的層次，釐清 AI 擬真情感在實際互動中能／否／如何取代親密與情感。

三、研究方法

本文以後人類思潮為理論框架進行小說分析，探討林新惠《瑕疵人型》與《零觸碰親密》呈現的 AI 時代中，人類面對情感擬真與身體代理的焦慮，如何回應當代技術社會中「人」之界限的變化。

海爾斯 (N. Katherine Hayles) 以「資訊失去身體」與「具身化 (embodiment)」對比「身體 (body)」之區分，²⁴ 主張後人類文化將資訊視為可跨載體流通的模式，而身體為可被替換的承載物，本文據此檢視小說中資訊如何凌駕肉身、以及身體如何反向生成能動性。海爾斯追溯了 20 世紀中葉控制論與資訊科學的誕生，改變了人類對「身體」與「意識」的理解結構，並將此轉向稱為「資訊失去身體」 (information lost its body)，意指資訊從物質基質中被抽離，成為一種可跨載體流通、可複製而不損內容的抽象實體，²⁵ 在此邏輯下，心智可被想像為純符號處理的過程，而身體僅是暫時的外殼，亦即，人可被還原

24 N. Katherine Hayles, *How We Became Posthuman: Virtual Bodies in Cybernetics, Literature, and Informatics*, p. 2.

25 同註 24, p. 2.

為數據結構，並移植到機械或數位介面之中。然而，海爾斯並非全然接受這種去物質化的敘事，而是提出反向辯證，主張「具身化」(embodiment)與「身體」(body)不可等同：前者指具體而動態的在場經驗，後者則是社會與符號制度中被標記的物質形態：身體是論述的產物(object of discourse)，而具身化則是情境化且具行動性的實踐(contextual and enactive)²⁶；換言之，身體可以被制度定義、被技術重新編碼，但具身化做為實踐仍是必要且動態生成的開放性存在，本文據此延伸：即使資訊試圖剝離肉身，具身經驗仍以延遲、脆弱、疼痛與感覺的形式回滲資訊系統之中。

海爾斯透過控制論三階段論證資訊與具身的糾纏，亦可說是封閉系統與開放生成系統的競合：第一波控制論(1945-1960)強調系統的封閉性與反饋機制(feedback)，其典範是維納對「控制與通訊」的模擬。²⁷此階段資訊被理解為可量化的單位，人與機器被置於同一功能模型中。第二波控制論(1960-1980)出現了馬圖拉納與瓦雷拉的「自生系統」(autopoiesis)，將系統視為能自我生產的實體，為具身回返奠定理論基礎。海爾斯指出，這一波「重新安置了觀察者的位置」，承認所有知識都是具身的、在系統中生成的。²⁸第三波控制論(1980之後)，資訊與生命的邊界完全模糊：人工生命(A-Life)與虛擬現實技術使「模式」與「物質」的界線更加可滲透。她提醒，若不重申具身性，後人類的願景將滑向反身體的抽象唯理主義。²⁹在此脈絡中，海爾斯為後人類立論，指出資訊主義(informati-onism)如何去物質化身體，另一方面又透過具身論重申肉身在認知與倫理中的必要性：「後人類並非否定人性，而是將人重新理解為信息、技術與物質交織的混合體」。³⁰因此，真正的後人類研究非想像心智的數位永生，而在於理解技術環境中身體如何持續生成行動、受限並回應。林新惠的小說中便呈現人類意識可被複製、情感可被程式化的世界，技術取代身體已是科技時代無可回復的現實，因此身體如何以延遲、疼痛或故障的形式重新介入資訊流，形成能

26 同註 24，pp. 196-199.

27 同註 24，pp. 50-56.

28 同註 24，p. 138.

29 同註 24，pp. 247-252.

30 N. Katherine Hayles, *How We Became Posthuman: Virtual Bodies in Cybernetics, Literature, and Informatics*, pp. 3, 286.

動與倫理的臨界，反而成為小說中的核心焦點。回應海爾斯所謂「具身的再現」（*embodied representation*），即資訊系統永遠需要一個具體而有限的物質實踐者來完成其運作，³¹ 後人類不再是「身體的消失」，而是在資訊與物質之間重新配置主體性的契機。

其次是哈洛威透過「部分視角」與「親和政治」的概念，分析角色如何在技術治理下重新建構主體位置，使知識與倫理重返具身脈絡。海爾斯揭示資訊文化如何使身體被抽離，哈洛威則進一步聚焦於其抽離不僅是技術現象，更是權力與知識體制的歷史積累，她在《類人猿、賽博格與女人》³² 中提出「賽博格」（*cyborg*）作為反諷的政治神話，以此對抗西方人文主義長期以來的二元結構：自然／文化、男性／女性、有機／機械、自我／他者。賽博格標誌著臨界時刻：在資訊與控制技術主導的世界中，「我們已經都是賽博格」，既非純然自然的有機體，也非全然人工的機械，而是由符碼、電路、感官與記憶共同構成的混種存在。其主張打破了人類作為中心、自足而統一主體的神話，使身體與知識被重新定位於關係網絡中：當身體被重新理解為資訊節點與通訊界面時，舊式的人文主體已無法維持其穩定性，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必須面對「支配的資訊學」（*informatics of domination*）的複合存在；在這種體制下，知識、生殖、勞動與戰爭都被重新編碼為資訊流動與控制的問題。然而哈洛威並未將賽博格神話理解為人類喪失身體的象徵，而是視為「重返具身性」的進路。她認為真正的賽博格政治不在於擁抱無限的科技融合，而在於承認身體作為混合界面的脆弱性與可變性，並藉此發展出「情境理性」（*situated rationality*）與「部分視角」（*partial perspective*）的倫理。她批評科學理性的「上帝視角」（*the god trick*）：任何聲稱全知、全景式的客觀觀點，都掩蓋了觀察者的身體位置與權力關係。因此她提出「處境知識」（*situated knowledges*）作為女性主義的替代認識論：知識不是逃離身體的純粹觀看，而是以身體為條件、以具體關係為界的局部認識，承認自己的侷限，並在侷限中追求誠實的連結，因此奠基於此視角的理性是有方向、有

31 同註 30，p. 291.

32 唐娜·哈洛威（Donna J. Haraway）著，張君玫譯，《猿猴·賽伯格和女人：重新發明自然》（台北：群學出版公司，2010.11）。

脈絡、有責任的概念。小說中的角色被置於演算法、監控或親密合約的網絡之下，其知識與判斷在局部資訊中不斷協商其可見與可言說的範圍，如同「部分視角」的概念，揭示權力如何在不同層級中被分散：從家庭照護的規範，到身體情感的數據化。哈洛威的主張提醒科技時代的人類，必須追問主體在什麼條件下能以有限的知識作出回應、形成責任，同時將處境知識延伸為一種「親和／類同政治」（politics of affinity），用以挑戰傳統女性主義訴諸「本質相同」的身分政治；親和政治注重聯結而非同一，追求跨差異的共構，而非以性別、種族或階級為預設的同質群體，不依賴中心化的控制，而是由多重節點間的關係構成。因此《瑕疵人型》與《零觸碰親密》角色之間的倫理關係不是由血緣、性別或國族穩定地定義，而是由技術介面、感官互動與情感回饋形成的臨時結盟，聚焦於角色如何在控制與親密的網絡中生成有限而具責任的主體位置。

更進一步，本文援引布拉伊多蒂（Rosi Braidotti）的關係式後人類倫理以其「具身、嵌置、局部性可責」的主體概念，分析兩小說如何在去身體與具身經驗的部分視角下，開啟以共生、差異與回應為核心的倫理想象。其主張拒絕把後人類視為人類消失或機械凌駕的表徵，而將之視為生命的重新佈署，即生命力在多重物質性之間的流動與關聯。這種流動不否定人，而是使「成為人類」（becoming human）重新被定位為一個與非人存在、與技術、環境及他者共構的過程。布拉伊多蒂在此提出「具身、嵌置、局部當責」的倫理框架：後人類主體不是抽象理性或自足意識的復活，而是一個具身（embodied）、嵌置（embedded）、局部而可責（accountable and partial）的生成性存在。³³ 其所謂的主體性立基於以下前提：首先，主體永遠位於關係之中，而非對立於世界。其次，生命本身具有「生成性」（zoec generativity），一種跨越人類物種界線的持續生成力量。最後，倫理奠基於對關係性與生成性具有回應的能力，而非自主的理性判斷，我將其稱之為「關係式後人類倫理」。其核心並非道德禁令或評斷，而是培養回應、維持差異、增進共存的能力，並且承認後人類的物質性：人類並非孤立自足的個體，而是技術網絡與地球系統的節點。在此脈絡下，布拉伊多蒂把「當責」

33 Rosi Braidotti, *The posthuman*, p. 49.

(*accountability*) 重新定義為一種分布式的實踐：主體的責任在於承認自己與其他存在的互滲與共構，即「後人類主體是嵌置的、局部的，並且能對其所在位置與所參與的關係網絡負責」。³⁴ 倫理判斷因而從個體義務的框架，轉向關係動態的尺度；倫理並非質問「我該做什麼」，而是探索「我與誰共生，我的行動如何影響他者的生成」。布拉伊多蒂所提出的後人類互動重構並非基於脆弱性的反動式連結，而是基於肯定性的連結，使主體置身於與複數他者的關係流中（*The posthuman recomposition of human interaction that I propose is not the same as the reactive bond of vulnerability, but is an affirmative bond that locates the subject in the flow of relations with multiple others.*）。³⁵ 本文則認為，面對科技「干擾」人類主體而產生的「共脆弱性」並非消極的共同體，而是主體在技術介面中暴露、互相影響與被影響的關係生成場域；「暴露」揭示了主體始終處於多重他者的關係流動之中，因此脆弱性乃是倫理生成的條件，迫使主體承認自身的有限性，並在差異中尋求回應的位置。此處需補充說明的是，本文使用「共脆弱性」的概念並非忽視人機之間懸殊的權力結構，掌管情感經濟的 AI 系統更接近哈洛威所批判的「上帝視角」，其「故障」本質上仍是演算法無法涵蓋變異數據的技術瑕疵，與人類承擔歷史傷痕的倫理負荷力不可等同。因此，本文以「共脆弱性」為分析基礎，旨在聚焦於技術治理下的關係生成場域，而非浪漫化人機之間的對等共生，更非掩蓋系統強行刪除女主角意識此類演算法極權的政治批判張力。《瑕疵人型》與《零觸碰親密》中描繪技術治理下的身體與情感時，即映射出倫理議題：在被演算法統御的社會裡，責任被分散在平台、規範與裝置之間。因此《瑕疵人型》中的微小故障與瑕疵並非單屬敘事上的異常，而是倫理的閃現處，迫使系統承認自身的有限，並邀請角色進入一種共脆弱的關係。布拉伊多蒂所謂「肯定式的關係流」所產生的倫理，不以懲罰或贖罪為目的，而著重維持關係的生成動態性。《零觸碰親密》中被設計為「無痛」的情感治理機制，看似消除了倫理的必要，卻在身體貼膚的瞬間暴露出關係的不可計算性；這些瞬間亦回應本文主張有

34 同註 33，p. 190.

35 同註 33，p. 50.

限性並非人類的缺陷，而是構成回應與共生的條件。當角色在技術親密的制度中重新學習感知彼此、承受差異與錯位，倫理超越了對外在規範的遵從，轉向對關係中他者持續在場的回應行為，布拉伊多蒂認為後人類的倫理是一種肯定式的倫理（affirmative ethics）：拒絕以否定為核心的道德語法，而以關係的生成力作為倫理的出發點。例如，在《瑕疵人型》中，當平台語言與角色的身體節奏發生偏移，倫理便不是要裁決誰對誰錯，而是檢視這種偏移是否創造了新的關係能量；在《零觸碰親密》中，當貼膚的呼吸取代演算法的精準配對，倫理的焦點也從規範性轉向互感與共存的能力。當身體成為資料節點，情感成為控制指令，倫理的重心轉向「如何維繫多樣生命的共時存在」，正如布拉伊多蒂所言，「我們必須學會思考我們的有限性，而非逃避它」。³⁶海爾斯指出資訊文化如何去物質化，哈洛威開啟在局部中重構主體的可能與流動開放性，布拉伊多蒂則嘗試在去人本主義的基礎上，探索科技後人類的倫理層次。

四、親密的臨界身體——從被取消的感受性到再佈署的後人類倫理

（一）《瑕疵人型》：親密的瑕疵、複寫與責任

《瑕疵人型》中收錄多篇科幻短篇小說，主題以「科技婚姻制」與「系統化繁殖」為背景，親密關係被納入國家運算的演算法中。首篇〈瑕疵人型〉³⁷中的親密從關係事件抽換為可被召喚與驗證的資訊「模式」：誓詞作為程式碼被投射於空中，光束鎖定無名指，跪起、拾戴、墜落、誦唸構成可複寫的序列，身體被動成為執行端的介面，最後以「她有一具忠誠的夫」翻轉人類與符碼妻子的人機界限：

「我是好男人好丈夫好父親，忠誠養家是我的責任。」一年多前，他踏入系統黑牆前的透明長方體，忠實唸讀系統打在空中的字樣，同時系統的光束堅定停在他的左手無名指。那是宣誓，也是儀式。如今他的身體就是一場

36 同註 33，p. 190.

37 林新惠，〈瑕疵人型〉，《瑕疵人型》，頁 32。

儀式。……他沒有終止地重複。彷彿從他誕生之時，他的基因，他之為他的內部程式，就已經被寫定。彷彿有一組程式碼，給他一道永恆的指令，即是無止無盡持續這一場操演儀式。……她微笑，笑得如同她的身體那樣透明瞭然——她有一具忠誠的夫。³⁸

海爾斯（1999）曾指出後人類條件的核心在於將資訊視為可跨載體無損流通的「模式」，而將物質實現視為偶然，由此導致代理身體（represented body）凌駕具身經驗：代理身體被系統語言與視覺裝置召喚並監看，實踐身體（enacted body）則被扁平化成合規動作的承載。換言之，忠誠在兩者之間以不可預期的回應生成之本質，被重新定義為模式是否正確執行以及是否通過驗證。此符碼的翻轉置換了主體邊界：以皮膚為界的主體被打散為透過回饋迴路與積分介面被組裝的節點。於是，親密的「取消」並非消失，而是被編排成可存取、可加總、可遠端流通的資訊數據；具身性的時間差、觸覺與脆弱，被排除在可衡量的輸出之外。除了將親密與倫理外包為「可存取的資料事件」，身體被重編為可感測、可加總、可遠端傳輸的介面，性別區分的流動展演性亦成為日常：「婚姻積分指南……如果你的結婚對象是女性，那麼你要盡可能男性化……他非常有意識地在會議中、在和他人的互動中，露出左手的戒指，因為那可以對外展現他的身分與忠誠。……這些小舉動，都能透過戒指感應，形成積分，傳輸到房裡的妻子。」³⁹於是「代理身體」被設計成顯示→輸出的端點，而「具身化」於處境中的感覺→行動被邊緣化，如海爾斯所說，虛擬文化將「資訊」與「物質性」視為可分離的層次，並賦予資訊更為根本與重要的地位，形成身體被降為次要或可替換載體的感知結構。⁴⁰在此架構下，身體不再是感知與行動的生成條件，而被視為資訊輸出的界面，使具身經驗在運算模型中被邊緣化。小說中的「極男性化」外型規訓與「露出戒指」的展示，是為了讓感測硬體與平台語法更容易辨識差異、計算「差距值」並折算為積分的最佳化策略，取消了親密關係中的互為回應與承諾；因此身體被

38 同註 37，頁 43。

39 同註 37，頁 32。

40 N. Katherine Hayles, *How We Became Posthuman: Virtual Bodies in Cybernetics, Literature, and Informatics*, p. 18.

規格化為感測點，動作被格式化為編碼，親密則被轉碼為可重複輸出的模式，即本節標題所說的「複寫」：親密與身體被抽象化為可被重複執行、可被移植與驗證的資訊模式，使原本具身且具時間性的關係事件，被壓縮成可調度與可核銷的程式化序列。主體邊界在此隨之改寫：皮膚不再是身體終端界限，而由戒指感應、上傳與遠端配給的回饋迴路所界定；所謂「忠誠」也取消了在兩者之間以不可預期的互動生成，而是作為一筆「已上鏈」的存取記錄，經由系統接口「傳輸到房裡的妻子」。⁴¹ 小說提出了科技時代，封閉主體的整體性被取消，以另一種形式展開擴延：儀式節點的模式優先，向日常節點外溢為積分制度，關係成為為可被呼叫、可被核銷的資訊事件；而具身性的時間差、觸覺與脆弱，被迫退居不可度量的陰影，等待在他處以「重新佈署」的方式迫使界面回應。

「自她瞳孔的黑洞，他跌入她體內的 LCL。像一顆方糖浸泡水中，他的氣力融解但身體完好。每一絲肌肉纖維都不再張弛，任憑自己被輕柔地托住，被溫和地覆蓋。」⁴² 「什麼也沒有。所有他的推論都被無明的現狀抵銷。」⁴³、「她的片段。身體的渣滓，聚合又分散。無數個她與她的殘肢斷骸，飄零地撫觸他，親吻他。……彼此無限逼近，又無盡遠離。」⁴⁴ 〈Lone Circulates Lone (LCL)〉⁴⁵ 以一連串沉浸場景把先前可模式化的親密拉回具身層次的現場：「像一顆方糖浸泡水中」與「被輕柔的托住」、「被溫和的覆蓋」經驗被定位為特定場景中的感覺與姿態，而非可計算的指令序列。「什麼也沒有。所有他的推論都被無明的現狀抵銷」⁴⁶ 此時模組卻出現不可預知的失配（mismatch），導致代理身體的編碼失效，理論與擬真都無法把經驗的感知回饋給模組，作者以「無明」暗示系統潛存的「缺陷／故障」，無以名狀、無以配接的游離因子。小說並以碎片的聚散描述非線性的觸覺與距離感，讓「親密」呈現海爾斯所說的由「在場與缺席」轉向「模式與隨機」的未知張力。所謂的隨機並非漏洞，而是具身趨力對資訊主義的校正力量，

41 同註 37，頁 32。

42 林新惠，〈Lone Circulates Lone (LCL)〉，《瑕疵人型》，頁 45。

43 同註 42，頁 46。

44 同註 42，頁 47。

45 同註 42，頁 45-50。

46 同註 42，頁 47。

迫使系統承認不可完全翻譯的噪音與黏滯，讓關係從系統驗證的完成狀態，返回需要回應與承擔的在場。換言之，LCL 並未恢復超越的本質，而是以身體的時間差、失重與觸碰，重新佈署親密與責任的運作條件，使親密再度依賴物質載體與反饋迴路而在場。

因而，真實與虛擬的界限在「無明」的張力下漸趨模糊。〈安妮〉的情節凸顯「安妮在移動。……原本坐著的安妮，自己推開椅子，起身，收拾餐具……他還站在飯廳角落，沒有任何動作，彷彿他是靜止的人偶，而安妮才是過著生活的真人。」⁴⁷ 先前被制度徵用的代理身體只需展示忠誠、輸出數據碼；而當「安妮在移動」（自發推椅、起身、收拾）的敘事讓實踐性的具身載體則在無可預知的微差裡接管現場。當科技將關係取消為可監管的序列、身體退為承載，實踐載體卻無法化約為單純物件，而必須與境況中的感覺與行動耦合，也就是與環境、工具、節奏形成反饋的「正在做」。小說在此讓反饋迴路翻轉：不是他以戒指與流程證成關係，而是安妮以行動創發了一個需被回應的現場，逼使界面（系統語法、感測邏輯）承認自身不足並讓位。看似只是「玩偶動起來」的驚悚瞬間，實際上卻是代理身體與實踐身體發生位移的關鍵節點，親密的判斷準則因此再由「是否完成流程」被反轉為「是否生成回應」，主體邊界也由皮膚與宣誓轉為能否維持感覺及行動的配接。亦即，透過實踐身體在日常節點的佈署，以微小且無法預知的身體展演，把被抽象為模式的「親密」具身化為可負責、可追溯的關係事件。從蓋勒格對「身體圖像」（body image）與「身體圖式」（body schema）⁴⁸ 的區分來看：「原本坐著的安妮自己推開椅子起身」處理身體如何出現在感知場，一連串極度尋常的微小動作（收拾碗盤、行走、蹲下為他擺好拖鞋）則重構房間裡的感知場。長久以來，他的妻子只是家中陳設的一部分，是一個經由視覺配置、被他與體制共同觀看的「身體圖像」；而當安妮開始走動、刷碗、清掃，他首次面對一個以身體圖式主導空間秩序的「他者」；此處的反轉並非只是他主觀感覺的震撼，而是身體圖式重新占據敘事核心。蓋勒格指出，身體圖式是一組主要在

47 林新惠，〈安妮〉，《瑕疵人型》，頁 55-56。

48 Shaun Gallagher, *How the body shapes the mi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24-25.

前反思層運作的感覺及動作協調結構，無需主體以第三人稱方式「看見」自己，卻持續在姿勢控制、動作調整、物件操作中預先構築場域。安妮所展演的即是圖式性的實踐：她行走時對地板的重量分配、端盤子時對平衡的微調、彎身擺鞋時對距離的精準拿捏，全都不需語言參與，也不需系統指令授權。她「像家事清潔人員」那般熟練操作環境，讓讀者看到一種不依賴積分、也不依賴宣誓的身體智能，另一方面，他卻「彷彿靜止的人偶」。⁴⁹ 從蓋勒格的觀點而言，其身體圖式暫時退場，只剩身體圖像以一種幾近旁觀者的方式看著自己原本生活的場域被他人重新組織。此處的僵直不是單純的驚嚇，而是前反思身體耦合的暫時停擺：日常動作的自動協調失效，他無法自然加入收拾、互動的連續鏈，只能呆立一旁，任由安妮的身體圖式改寫空間的使用方式。此現象亦印證海爾斯所說實踐身體的回返：安妮從一個被系統代表、被男性主角觀看與宣誓指向的「妻子」，轉而成為在家務實作中，以身體的前反思協調與姿勢調整迫使界面做出回應。她的每一個動作都在提醒讀者，真正決定親密是否存在的，不是戒指傳回系統的訊號，而是日常中誰的身體在實際承擔責任的「先行行動」，此刻系統設定的儀式與積分機制被取消，具身的動作反之在時間向度產生持續延展、佈署未來的性質。

其後記〈瑕疵無處回收〉亦特別提出「glitch」暗示所謂「無明」的狀態：「glitch：機械的小瑕疵、小故障；流散的電流或訊號導致機體停擺。……機械會跳針、當機、自我重複。……訊息流，跨不過那輕微的失誤，就這麼走入死路又無從轉身。」⁵⁰ 作者將「glitch」敘述為訊息流無法逾越的輕微失誤，導致「跳針、當機、自我重複」；轉換為海爾斯的觀點，控制論和資訊學的語法假設資訊理應可以「無損傳輸」，也就是說，從節點到另一個節點的訊息傳遞，其理想狀態是無摩擦的連續：訊號不被干擾、不被延遲、不受物質載體影響，然而這便是資訊主義的根本幻覺，亦即相信「模式」可以不依賴任何具體載體。而「glitch」正是在這種幻覺中出現的微小阻滯，訊息流「跨不過那輕微的失誤」，模式的連續性被打斷，系統不得不意識到自己仍然受制於具體的物質條件，訊號在某個節

49 同註 47，頁 56。

50 林新惠，〈瑕疵無處回收〉，《瑕疵人型》，頁 247。

點被延遲、失真、迴圈、自我重複。然而這也正是身體重新現形的時刻：當傳輸不再順暢，我們才重新察覺到資訊必須依附於具體物質（如機體、神經、觸覺）才能存在。模式要求平順傳輸與可重複，微故障使數據流在實踐身體上「絆倒」，迫使代理身體暴露其作為顯示／輸出端點的有限，並把注意力移回實踐身體的動作上。於是「取消／佈署」形成並置結構：在儀式與積分的節點，系統以可見、可驗證、可加總記錄的模式取消親密；而微故障卻打斷資訊流的完美連續，讓身體的摩擦與延遲重新成為關係生成的條件，親密便在實踐層次被佈署回可感覺與可回應的在場。因此「停滯」的時刻在技術身體的界面上取得發言權，令資訊回到其物質實現與反饋迴路之中，成為具身化進場的必要條件。換言之，微小失誤構成了倫理場域，使取消與佈署在不同節點上同步運行，將關係從可取消的物件，反轉成需要回應、可追溯且承擔責任的「在場」。以蓋勒格的視角補充，微故障即為前反思身體條件浮上海面的瞬間，依蓋勒格所述，身體並非只是輸入資訊的通道，而是在「前概念、前命題」（*prenoetic*）層次上，作為一組限制與可能性結構，預先形塑感知與行動空間。⁵¹ 換言之，他以「身體基模」（*body schema*）指稱一套感覺動作功能系統，此系統運作於自我指涉意向性之下，不以知覺、信念或態度形式直接呈現，而以默會的前意識與次個體歷程動態支配姿勢與動作。在多數情況下，個體的移動與姿勢維持正是透過身體基模近乎自動的運作完成，因此正常成人在世界中行動時，無須持續保持身體知覺，身體依然持續調節與協調其感知與行動。⁵² 亦即，身體並非只是輸入資訊的通道，而是在「前概念、前命題」（*prenoetic*）的層次上，作為一組限制與可能性結構，預先形塑感知與行動的空間。此處以蓋勒格對身體意象與身體基模的區分來理解「擬真情感」與「情感聚現」的差異：身體意象是意識層次的呈現，以片段化與抽象化的

51 同註 48，p. 135. 蓋勒格於“*Prenoetic Constraints on Perception and Action*”一章中批判當代認知科學雖宣告揚棄笛卡兒二元論，實則仍以「腦中之缸」（*brain in a vat*）式的無身體觀念殘存其中：身體被化約為「提供認知運算所需之原始感官輸入」（“considered important only to the extent that it provides the raw sensory input required for cognitive computations”，p. 135）或為可被矽基硬體取代的功能單位。Gallagher 據此主張身體並非僅為資訊通道，而是以前概念之限制與可能性結構，積極形塑感知與行動。

52 同註 48，pp. 32-33. 蓋勒格以日常例子說明：“a body schema operates in a prenoetic way means that it does not depend on a consciousness that targets or monitors bodily movement my attention is not directed at the specific details of my motor behavior”，p. 32.

方式構成人對自身身體的感知，一次只能將部分身體帶入注意範圍；情緒分類模型與臉部辨識技術多取材於此層次，因此能在某些情境中產生相似判讀。然而蓋勒格指出，真正使動作與感知得以運作的並非身體意象，而是運作於意識之前的身體基模。基模以整體且動態的方式調節身體，調整姿勢、維持平衡並生成動作，其中牽涉大量非意識的時間性變化，即使人能在意識中察覺自身的某些動作面向，基模依然持續作用，並超出意識可捕捉的區域。身體意象與基模之間的差異涉及表徵與動態的對比，也關乎與環境的關係模式。意識中的身體通常被界定為與外界分離的個體，而基模在與環境的互動中保持連續，甚至會將外在物件納入自身的調節架構，使身體在行動中與周遭環境形成「臨時性的整體」。其跨越身體界線的運作，而構成行動者在世界中，溢出意識層次的「在場」；同時，行動的意向通常會遮蔽身體的運作，使身體呈現透明狀態，只有在中斷或失衡時才重新浮現。換言之，身體基模的前認知過程總是被吸納於更大的行動目的之中，並以行動者的意向為原則，而非依循可計算的數據或訊號。

從此觀點看，AI 的情緒輸出與模擬回應僅能觸及身體意象層次，也就是可被擷取與計算的表徵。其運作方式是從資料庫比對、特徵抽取或語音分析中生成情緒標籤，這些皆屬可識別與可替換的資訊效果。然而真正的情感聚現於基模與環境之間的動態耦合所形成的時間性事件，而非表徵層次；亦即情感的生成乃是依賴身體的整體調節、前反思的延遲與在場的回應性，正因為基模的運作不可完全表述、不可完全預測而且不可替換，情感聚現無法被壓縮進即時輸出的分類模型之內。由此可見，擬真情感與情感聚現的差異在於是否包含支持回應性的具身條件，而非輸出內容是否相似。循此脈絡，AI 的情緒生成既無身體透明化的條件，也無基模與環境互動的整體調節能力，因此只能產生模擬親密的語法效果，而無法生成能承擔關係重量的倫理回應，此亦本文主張「情感擬真」無法取代「情感聚現」的基礎，並可進一步嘗試形構人機互動倫理的範疇。亦即，身體圖式與本體感覺（*proprioception*）在平時隱身於背景，維持動作協調與感知穩定，一旦內在協調出現微小錯位，主體才會驚覺「有哪裡不對」。換言之，錯誤本身就是前反思機制被顯影的方式，身體則在最微小的失誤裡為感知與行動劃出不可逾越的邊界。

簡言之，《瑕疵人型》揭示了親密的制度化過程：婚姻對象由系統配對，親密被轉化為可被複製、可被運算的資訊模式。然而，制度系統並無法完全掌控具身的裂縫，男性角色在例行的「穿戴儀式」中，面對科技生產的妻子，體驗既熟悉又疏離的情感延遲。其疏離產生的親密延遲即是「納入（incorporation）」對抗「銘刻（inscription）」的瞬間；親密雖被程式化，卻仍需透過具體身體的感知、懷舊與重複動作才能維持運行。也就是說，即使制度把身心的親密「取消」成可配給的數據，在日常中被身體「重新佈署」回具身層次；系統把感受取消為「情緒頻譜」，再透過疼痛記憶與身體延遲，佈署可回應性；修補情節將「無痛」呈現為政治命令，同時又以貼膚之感開啟倫理的回返，知覺與記憶則被可視化、數據化，身體變成可重播的代碼的種種「完美」配置，微故障才是技術與人類共存的條件，瑕疵成為人類存在的證據，揭露人／機的「共脆弱性」，並開啟科技時代新的倫理關係。

（二）《零觸碰親密》：感受、情緒與無痛身體的再配置

林新惠的另一部小說《零觸碰親密》更直接指向「感受政治」，情緒被徹底納入演算法治理體系之內，成為可被測量、管理與優化的資訊流，而身體則被邊緣化為可被替換的載體。情節設定在以「情緒頻譜管理」維持社會秩序的時代，所有正向與負向情緒皆被量化、抽換與重新分配，人工智慧系統聲稱能以演算法調整人類情感，使之保持恆定與平衡，感覺成為可輸入輸出的數據，與具身經驗脫鉤。主角被「修補」成「無性徵、無痛覺、效率完美」的身體後，親密被定義為絕對穩定與無風險的連結。然而，主角對「疼痛」的追憶顛覆了這種理想；她意識到真正的感受並非無痛，而是能承擔他者介入所引發的不安與裂縫。「疼痛」因此成為倫理復歸的場域、感知仍然指向他者的證據。主角對喪親的感受，並非經由悲傷、震驚或失落的身體反應，而是透過「情緒模組」所回傳的資料加以理解；母親在醫療系統中逐漸被抽象化為一組可被監測的生命指標，當心跳與呼吸曲線走向平坦，系統給出的不是「死亡」的存有論判決，而是「訊號中止」的資訊事件，是一個被瞬間「確認」的狀態轉換，如海爾斯所指出，控制論的觀點下，身體被理解為可替換的「原初義肢」，具身性因而逐漸讓位於資訊，成為後人類

主體的核心特徵。⁵³ 本研究據此延伸在後人類觀點裡，死亡不再是肉身生命的終點，而是資訊連續性被中斷的結果。因此主角對母親的思念，不是對一具曾與自己共享時間與空間的身體的追憶，而是對一個被系統宣告「不再輸出資料」的節點的凝視。親密關係的第一個層面，便在這種資訊邏輯的主導下，被取消為從「有訊號」到「無訊號」之間的差別。小說中的「情緒管理政府」進一步將情緒視為可標準化、可預測的社會資源。政府發表的簡報指出，人類一生中真正處於「正向感受」狀態的時間比例極低，多數時間則在焦慮、憂鬱與空虛的光譜上緩慢擺盪，因此必須透過演算法計算「最佳情緒配置」，降低社會層級的整體「情緒波動成本」；類似海爾斯分析的控制論，系統試圖排除具身性的「噪音」、不可預測性與情境性，使身體在資訊框架中被視為可被操作的界面，而非感受與生成的主體。在資訊治理系統中，主角進入「虛擬動物園」的體驗成為小說的轉折：她戴上裝置，視覺與聽覺沉浸於模擬世界，海浪聲、鳥鳴、樹影搖晃、擬真的動物身形，全都在螢幕上逼真重現。然而當她「踩進海水」時，雖然系統輸出了冰涼的訊號，腳底卻沒有真實的濕潤，鼻腔與舌尖也感受不到鹹味與海風的氣味。亦即，海風、冰涼、光線、聲響等皆可被精確製造，但其「完美」的精確性卻抹除了差異與位置。此處揭露了資訊與具身的斷裂，即系統能夠運算視覺與聽覺的複雜度，卻無法調度身體所有感官之間的互相補充與交互調節。依蓋勒格的觀點，感知並不是單一感官的輸入，而是身體在世界中的感覺與運動迴路所形成的整體活動。⁵⁴ 小說藉由虛擬體驗的「幾乎為真」指出資訊本體論無法彌補的結構性缺口：即便數據資訊何其豐富堆疊，只要身體沒有真正浸入環境，感覺便無法成立。

哈洛威早期發表的〈賽博格宣言〉中以「支配的資訊學（informatics of domination）」描述晚期資本主義權力結構的轉換指出，現代技術體系不再以工業化身體為中心，而是以資訊流與可分割的模組化單元構成社會秩序。⁵⁵ 她並列出一份「轉換表」（chart of transitions），身體不再被視為具有本質性的自然單

53 N. Katherine Hayles, *How We Became Posthuman: Virtual Bodies in Cybernetics, Literature, and Informatics*, pp. 2-3.

54 Shaun Gallagher, *How the Body Shapes the Mind*, pp. 141-142.

55 Donna J. Haraway, "A manifesto for cyborgs: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alist feminism in the 1980s." *Socialist Review*, no. 80, pp. 65-108.

位，而被重新定位為可處理、可運算、可交換的資訊節點，而性別、種族、階級等差異，也從社會歷史脈絡中被抽離，轉化為系統運算中的變數，成為新形式支配的條件之一。⁵⁶ 哈洛威進一步指出，「支配的資訊學」之所以成為新的權力形式，是因為它將不安全與文化匱乏加劇到極致，使最脆弱的群體失去維生的社會網絡。⁵⁷ 因此，在此資訊化治理邏輯下，身體被拆解、差異被資料化，而權力則以科技網絡的形式滲入日常生活之中，如小說中的「Free hugs」與公共觸碰行動，表面上打著自由與解放的口號，實則為情緒治理提供更多可運算的觸碰樣本，使親密更徹底的轉化為資訊資本。在此設定下，主角對「零觸碰」的渴望反而顯得異常：在充滿被規劃觸碰的城市裡，她選擇退出情緒市場，不再參與高回報的觸碰活動，而是執著於一種幾乎無法命名的「距離」，因為她知道自己所能提供的觸碰，總會被記錄、被運算、被轉售為他人情緒穩定的成本。零觸碰於是成為一種消極的「不合作」策略，企圖讓身體暫時從資訊流中撤退，使某種還未被建模的感覺有機會浮現。本研究認為，其退場並不是回到前現代的身體純粹性，而是試圖為具身性爭取不會立刻被模組吞沒的時間差。值得注意的是，此種「情感擬真」的技術治理基礎並非中性的資訊管理，而與性別政治彼此交織。哈洛威所批判的「支配的資訊學」在《零觸碰親密》中以細膩的性別敘事呼應其論述；小說描述的情緒治理系統除了剝奪身體的感官自主權，更將性別化的情感勞動呈現為新形態的系統性壓迫。主角作為義體化的女性主體，其「情感輸出」被系統設計為可量化、可監控、可商品化的資源，而此過程本身即再製了將女性鎖定於無償情感照護的異性戀父權邏輯。演算法極權並未如賽博格宣言所期待的打破性別二元，反而以更隱蔽、更全面監控的方式鞏固了性別差異的剝削結構，使女性主體在虛擬親密與情感勞動的雙重框架中持續邊緣化。因此，本文對主角「感受失效」的分析並非僅限於存在層次的討論，更取徑於後人類女性主義的政治批判。另一方面，本文認為小說敘事並非單純展現對科技的悲觀，而是試圖在後人類情境下尋找新的具身倫理的可能。尤其當情緒被建模為「投資報酬率」之後，主角被收

56 同註 55，pp. 161-165.

57 同註 55，p. 172.

編入一個以觸碰為算計的經濟體系，每一次觸碰都被轉譯成可量化的「情緒收益」而被輸入情緒市場的資料庫中，以供演算法調整全球的感受配置。觸碰因而不再是一種自發的關係實踐，而是被迫服從於「最適化」邏輯的工具，觸碰的性別化意義似乎因科技而解脫，卻又收編於系統連結的陰性特質：女性、觸碰、情緒、終極的服從。

小說最具張力的情節在於主角與生化人的相遇。當她將手放入生化人的胸腔、觸碰那具被設計來模擬人類情緒的身體時，小說詳細描寫手掌與機械肌理之間的溫度、重量與阻力。本文以為，此刻主角除了檢測對方是否正確輸出「安慰」「陪伴」的情緒模組，另一方面亦被迫承認自己的身體也在這個接觸中被改變。蓋勒格指出，前反思的身體耦合並不依賴語言或內省，而是在尚未意識到「我在觸碰誰」之前，感覺 \longleftrightarrow 運動系統已與他者形成一個互相調節的迴路。⁵⁸小說中的觸碰便具有這種性質：主角無法清楚命名自己感受到的是「悲傷」或「慰藉」，只知道自己胸腔的緊縮、皮膚的微微顫動與呼吸節奏的改變，已不再服從情緒模組的預設分類；生化人亦非單純的輸出端，而成為一個與她共同構成情緒場域的行動者。該場景顯然已跳脫「資訊傳輸」的身體模式，從可被描寫、編碼與測量的代理身體轉向實踐身體，即在具體情境中「正在發生的身體」。當主角的手陷入生化人的胸腔，情緒是一種在接觸中才得以顯現的身體狀態，該狀態無法被隨意複製或轉移，依賴的是這兩具身體此時此刻的相對位置、彼此歷史與共同處境。換言之，觸碰在此溢出被取消或量化的指標意義，重新成為具身的「關係」作用鏈。小說再次強化此具身關係：當主角在城市邊界的黑暗中向前行走，腳下的光點緩慢延伸成一條道路，最後將她包覆在耀眼的亮度之中。這道光並非上帝式的救贖，也不是虛擬實境的重新啟動，而是她在連續行走與感覺中，逐步重新認識自身的身體界限。援用哈洛威所謂「處境知識」(situated knowledges)觀之，知識始終從某個具體的身體出發，帶著局部性、有限性與責任。⁵⁹主角在光中的覺醒之路，不是獲得一個全知全能的上帝視角，而是清楚感覺到自己的身體在這

58 同註 54, pp. 220-224.

59 Donna J. Haraway, *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pp. 193-195.

個世界上有一個無法被資訊完全取代的位置。其自覺亦伴隨倫理的回歸：她取消自身在情緒市場中的「供給點」或情緒治理系統的「偏差案例」位置，而回返必須對自己的觸碰、後退與選擇負責的具身主體。整體而言，《零觸碰親密》並非僅表達人類把在科技發展之下，人類主體對賦能與失能的雙重焦慮；而呈現更複雜的後人類情境：一方面，情緒被資訊化、被治理、被商品化，使「親密」被取消成可加總的觸碰次數與情緒穩定值；另一方面，正因為這些過度運算，身體在其失效、延遲與不相容之處顯影，成為重新佈署親密的條件。海爾斯的後人類辯證提供理解這種雙重運作的語言，而蓋勒格對具身心靈的強調則揭示：真正的觸碰，總是早於語言與演算法，在前反思的層次上發生。⁶⁰ 從哈洛威的處境視角延伸詮釋，小說裡回返具身性所指向的並非面對科技而對人類本質的懷舊，而是學會在當下境況中，從自身所在的網絡位置出發，與技術、他者與自我之間重新談判責任與連結。⁶¹ 因此，《零觸碰親密》最終提出的問題是在親密早已被轉碼為「情緒投資」與「觸碰比率」的世界裡，身體是否還能開啟其他種類的關係可能性。小說透過主角一次又一次的遲疑、拒絕與試探性觸碰，親密在被取消與被重新佈署之間擺盪：AI 時代，具身親密是一項需要在科技進步與具身經驗交界處，不斷被重新發明與定義的關係式佈署。

（三）科技親密的倫理路徑

林新惠的兩篇小說共同描繪了後人類世界中「感受被取消、身體被重佈署」的過程：在《瑕疵人型》中，被取消的是家庭與婚姻之為人類親密的自然機制，親密被轉化為可預測的演算法規範，而被重新佈署的，是身體在儀式化與微故障中的能動性，瑕疵的意義翻轉而成人類回應世界的證據。在《零觸碰親密》中，被取消的是情感作為具身現象的特質，親密淪為感受管理的數據之一，而被重新佈署的，則是透過疼痛與差異產生的倫理開口——當身體被修補為完美，唯有疼痛讓人再次意識到他者的存在。兩文本皆反映了海爾斯所謂「銘刻／納入」

60 同註 58 及 59。

61 同註 59。

的落差：系統與身體永遠不同步，而不同步的瞬間正是倫理閃現之處。透過哈洛威的「部分視角」抵抗聲稱沒有位置、沒有身體、沒有利害的「上帝視角」（god trick）一本文認為小說裡的系統及情緒治理政府即上帝視角，而此種視角下親密變成「無位置的機制」，亦即誰都可以被取代、關係被格式化可計算的情境下，沒有主體、沒有位置，沒有誰需為誰負責；也就是說，責任被取消。因此所謂的責任來自主體對自己位置的承認；承認自己的侷限、他人身體的不可替代性、視角的偏差等，亦即《零觸碰親密》的角色開始覺察自身身體的邊界、延遲、無法全然掌握的感受軌跡時，當親密不再是可以被演算法抽象化的資訊流，而重新顯現為需要彼此回應、承擔與受限的關係鏈時。簡言之，唯有在具身脈絡性（situatedness）被肯認的瞬間，親密才得以重獲其倫理上的可追責性。然而，具身脈絡性交織的無限差異，在科技開啓的疾速時代如何實踐後人類倫理？布拉伊多蒂主張後人類的倫理關鍵在如何讓多重差異共存而不相互抹除，而非消除差異的「游牧主體」：後人類主體不再以人文主義的一元個體為基礎，而是建立在複雜性與生成倫理之上；主體從「單一的」（unitary）位置轉向多重移動的游牧主體（nomadic subjectivity），因而必須拒絕以「個體」（individualism）作為倫理的起點。⁶² 因此，後人類的倫理關係並非建構於個體利益，而是源於主體在複雜關係網絡中所形成的「另一種倫理連結」（ethical bond），使主體得以在差異與複數關係中提出局部性的可責位置，而非抽象且統一均質化的人性本質。⁶³

更進一步，布拉伊多蒂以「不一」（not-One）的概念說明，後人類主體在深層結構上係由差異與他者構成，而非一個可還原的統一自我；因此倫理的關鍵不在恢復一，而在承受這種不一，並在與眾多他者的關係流中尋找可回應的位置。⁶⁴ 例如在〈瑕疵人型〉中，丈夫在婚姻制度裡被召喚為一個典型的自由人文主義主體：「我是好男人好丈夫好父親，忠誠養家是我的責任。」⁶⁵ 這句誓詞將他塑造成一個可被指認的「好」主體，並透過黑牆前的宣誓儀式與戒指感應，讓

62 Rosi Braidotti, *The posthuman*, pp. 49-50.

63 同註 62, p. 49.

64 同註 62, pp. 95-96.

65 林新惠，〈瑕疵人型〉，《瑕疵人型》，頁 43。

他的身體成為制度的界面與顯示器，「如今他的身體就是一場儀式」。⁶⁶ 從海爾斯的角度看，這是資訊主義取消具身性的典型場域，然而，若從布拉伊多蒂的後人類倫理視角來看，問題並不只是「人性被技術抹去」，而是制度企圖把他固定為一個單一的「一」與穩定的身分類別，抹消他其實總是由多重關係流構成的事實：他不只是「好丈夫」，同時也是喪母的兒子、被系統規格化的勞動者、與玩偶妻子及未來「真人後代」糾纏在一起的節點。婚姻積分指南要求他「盡可能男性化」，藉由戒指感應、肢體姿態與社交場合中的自我展示，讓他的身體行為被持續蒐集與換算，形成雲端中的差距值與積分，該治理邏輯呼應布拉伊多蒂所批判的「單一主體」幻想，即體制以為可以透過演算法將他簡化為一個可計算的男性身分，忽略該主體其實是「多重歸屬」與「不一」之流的效應。另一方面，微故障則展演了此種「不一」如何成為倫理生發之處。當男主角跌入 LCL 之中，「像一顆方糖浸泡水中，他的氣力融解但身體完好」，他欲以《新世紀福音戰士》裡的同步模型理解當下經驗，卻發現「什麼也沒有。所有他的推論都被無明的現狀抵銷」時，出現眼前的不是一個可被掌握的「她」，而是無數個身體片段的聚合與分散，「無數個她與她的殘肢斷骸，飄零地撫觸他，親吻他……彼此無限逼近，又無盡遠離」。⁶⁷ 此場景除了映現海爾斯所說資訊模式與具身經驗之落差，更是覺化布拉伊多蒂所謂「不一」：他無法再把對方或自己當作封閉自足的個體，而是被迫承認兩者都只是多重碎片、流動碎屑與關係流中暫時凝結的形態。此刻便是布拉伊多蒂所說的倫理的起點，當主體意識到自己是「不可掌控的流動與相遇所產生的結果」，才會被迫在與多重外在他者的連結中思考責任。⁶⁸

《零觸碰親密》將情緒治理與觸碰經濟推向極致，把情感徹底納入演算法治理；看似完美的管理制度，觸碰被取消為一種可商品化的技術，卻在感覺現場處處暴露出無法弭平的裂縫。例如 VR 動物園能逼真合成視覺與聽覺經驗，卻無法生成具身的濕潤與氣味；主角與生化人的互動中，情緒模組試圖為她提供「設計好的安慰」，但她身體的遲疑、抽離與再次靠近，都落在演算法無法完全預測的

66 同註 65，頁 43。

67 林新惠，〈Lone Circulates Lone (LCL)〉，《瑕疵人型》，頁 47。

68 Rosi Braidotti, *The Posthuman*, p. 100.

間隙；這些失效與遲延彰顯主角作為具身主體，無法完全被納入情緒市場的計算模型之中、感受的無限推遲。結合蓋勒格的觀點做延伸詮釋，⁶⁹ 本文認為這些瞬間是前反思的身體耦合在抵抗抽象分類，透過具體的姿勢、呼吸與肌理變化，將感受維持為一個未被完全標記的「關係場」。另一方面，《零觸碰親密》更進一步複雜化了人機邊界，生化人並非純粹的工具或商品，而是情緒配置網絡中的重要節點。當主角在喪親之後將自己的悲傷投射到生化人身上，又在某些時刻反過來感覺自己被對方「看著」「回應」時，小說描寫的已非單向消費，而是人與生化人之間在觸碰與撤退之間形成的多重關係流，亦即布拉伊多蒂所說的「游牧主體」：個人內在的情緒狀態溢出邊界，與生化人、情緒裝置與城市政策纏繞出「不一」的交織網絡。⁷⁰ 倫理因此從探問「誰才是真正的人」，轉為「在這個多重他者構成的關係場中，交織其中的各個『不一』負有什麼樣的回應義務」。當主角拒絕某些被安排好的觸碰，或在關鍵時刻選擇退出情緒服務，正是為自己的身體和生化人的身體重新劃出位責任邊界。

《零觸碰親密》中，主角的感知失效並非單純的身體損壞，而是關於從「感知失效」到「承擔他者責任」的過渡。主角在與生化人的觸碰場景中，因身體的遲疑、抽離與再次靠近，迫使她意識到自身已無法以「情緒模組」的資訊框架理解眼前的關係事件。此種前反思層次的失效，如呼吸節奏的改變、胸腔的緊縮、皮膚的顫動等，正是「關係式當責」閃現的時刻；換言之，唯有在感知系統的確定性被打破之際，主體才被迫承認他者的存在無法化約為數據輸出，並在此認知中開始對關係負責。亦即，感知失效並非導向責任的單一「跳躍」，而是藉由具身的不適與迷失，逐步迫使主體「溢出」演算法給予的認識框架，進入以他者為條件的倫理生成歷程。綜言之，本文認為科技帶給人類面對自身主體邊界的被迫位移而產生對於被「取消」的焦慮。林新惠的小說反映的「取消」，以體制不斷企圖將主體與親密壓縮為單一可管理的模式展現，例如透過「好丈夫」與婚姻積分將主體收編為一個可量化的單位，或藉由情緒配置與觸碰經濟將感受轉化為數

69 Shaun Gallagher, *How the Body Shapes the Mind*, pp. 75, 143.

70 同註 68, pp. 49-52.

據資本。另一方面則在微故障、LCL 沉浸與觸碰失效的細節裡展開主體的「重新佈署」，讓主體重新顯現為「不一」的關係節點，迫使角色承認自己與多重他者的互動關係鏈共同構成一個共在倫理場，因此人機倫理從「人類是否被技術侵蝕」的層次，必須更進一步深入思考如何在後人類條件下，亦即由人與非人、技術與情感交織而成的差異關係，提出具身、嵌置且局部性的可責位置。所謂具身的意義在於主體必須承認自己有身體（有限性），同時意識到自己被關係與環境包覆的嵌置，並覺察自己視角永遠有限、無法全知而對關係網絡具影響力，因此對他者負有責任。也就是說，在布拉伊多蒂的後人類倫理裡，「應答性（answerability）」所指的責任不是抽象的德性，而是具體義務：第一，主體必須在具身接觸中回應他者的存在（responsive engagement）。第二，必須承受並承認自己對關係網絡造成的後果（acknowledging relational impact）。第三，必須揭露自身的限制與位置，使其回應不再假借普遍性，而是源自具體、嵌置且部分性的立場（partial, located accountability）。因此，後人類倫理不再圍繞「誰才是真人」的議題，而是探問主體是否承認並回應自己在後人類關係場中所構成的影響與責任。

五、結論

本文探究了在情感可以被演算法擬真、身體可以被技術重編的時代，人類還能以什麼姿態談論親密與倫理。《瑕疵人型》與《零觸碰親密》呈現當代技術統治邏輯發揮至極限的思想實驗：當婚姻可以被配對成最佳化組合，情緒可以被量化成頻譜與比率，身體可以被切分為感測節點與輸出界面，以往的人類主體敘事將失去其反映真實世界的張力。兩文本描述的是 AI 時代中，人類站在資訊主義與情感治理的交會處，親密被取消為可運算的「模式」，身體則被取消為可替換的「介面」。然而本文透過「取消／佈署」的並置，分析所謂的取消並未徹底抹除身體與關係，反而將其擠壓至臨界位置，迫使其以更頑強、更細微的方式重新現身。《瑕疵人型》中，宣誓儀式、戒指感應與婚姻積分將忠誠壓縮為可複寫的程序，親密被重寫成可被召喚與核銷的資料事件；但正是在微故障、LCL 沉浸與玩偶身體短暫失效的縫隙裡，具身經驗以時間差、失重與無以名狀的觸覺浮出

表面，使系統不得不承認自身對物質條件的依賴。《零觸碰親密》讓情緒治理看似收編一切，觸碰比率與情緒頻譜彷彿足以取代模糊而危險的情感關係，然而喪親記憶的陰影、生化人的遲疑、虛擬動物園裡的感官失配，則讓那些被系統定義為「多餘」的感受重新占據敘事中心。取消因此不是終點，而是佈署的條件；技術越企圖把親密還原為模式，親密越是以瑕疵與延遲的形式，召喚重新佈署的倫理。

本文提出「情感擬真／情感聚現」的區分，揭露後人類語境下親密倫理的基礎底線：情感擬真依賴可標記、可分類與可替換的表徵，關注輸出是否符合預期、回應是否貼合劇本；情感聚現則發生在具身耦合的時間向度之中，牽涉前反思層次的姿勢調節、本體感覺的延遲與他者互為回應的歷程。對此，需進一步審視的一點，在於當代 AI 技術已能透過演算法模擬人類的猶疑、延遲乃至「瑕疵」，人類的不完美或許並非完全「不可預測」。然而，本文認為此一反思反而強化了「情感擬真／情感聚現」的區分之必要；若 AI 可以模擬猶疑，關鍵問題便不再是「輸出是否相似」，而是「此回應是否源自具身的歷史負荷、承擔關係的後果」。模擬的瑕疵終究是對瑕疵的再現，而非具身存在的真實失效；能夠被優化、被重置的「故障」，與無法被消除的身體傷痕之間，仍存在著不可跨越的倫理距離。由此，本文提出「以瑕疵自證為人」的命題並非訴諸本質主義，而是探究在 AI 時代中無法被任意模組替換的歷史積累與關係責任。前者可以被最佳化與重置，後者帶有不可逆與不可替換性。林新惠小說中的 AI 與技術身體可以熟練模擬親密的語法，卻無法承擔喪親、懊悔與責任等關係事件的重量；人類角色看似享受情感服務的穩定與無痛，卻在身體被動員起來之際，意識到自己已被徵用為系統運作不可或缺的節點。因此本文認為後人類倫理的「差異」在於是否保留支持回應性的具身條件，是否承認關係之為事件的歷史厚度與傷痛的重量，而非輸出內容是否足以亂真的場域。資訊主義的去物質化敘事、支配的資訊學所造成的文化匱乏與不安全，以及具身且嵌置的後人類主體想像，在小說中轉寫為婚姻市場、情緒平台與家務場域中的情節。人與機器不再只是主宰與工具的二分，而是共同暴露於技術治理之下的共存者，分享相同的不確定性與失效可能。所謂「共脆弱性」，並非浪漫化弱勢，關鍵在映射人與技術都無法完全自足，必須在彼此

造成的摩擦中學習回應。而故障不只是系統的問題，亦是倫理得以開展的時刻：當模式無法順利運行，當痛感無法被完全刪除，當玩偶開始行動，「責任」真正浮現。

對當代 AI 討論而言，若僅以擬真程度、陪伴效果或情緒穩定性評估人機親密，便容易把關係理解為可被優化與替換的商品，忽略具身差異與歷史傷痕所構成的倫理維度。本文透過《瑕疵人型》與《零觸碰親密》的文本閱讀與分析，揭露 AI 可以在情感表徵層次做到極度逼真，卻無法取代依賴身體時間性與共脆弱條件生成的情感聚現；亦即在技術深度滲透的世界裡，人類何以為人乃是在取消與佈署之間的實踐，而人類與技術共同構成的關係網絡，將成為近未來倫理思考無可迴避的場域。



參考資料

一、專書

林建光、李育霖主編，《賽伯格與後人類主義》（台中：中興大學出版中心；新北：華藝學術出版，2013.12）。

林新惠，《瑕疵人型》（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2020.05）。

——，《零觸碰親密》（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2023.05）。

唐娜·哈洛威（Donna J. Haraway）著，張君玫譯，《猿猴·賽伯格和女人：重新發明自然》（台北：群學出版公司，2010.11）。

陳國偉，《類型風景：戰後台灣大眾文學》（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3.11）。

Ahmed, Sara.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emotion*.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4.

Braidotti, Rosi. *The posthuman*. Polity Press, 2013.

Gallagher, Shaun. *How the body shapes the mi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Hamilton, Grant and Carolyn Lau. editors. *Mapping the posthuman: Perspectives on the non-human i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Routledge, 2023.

Haraway, Donna J. *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Routledge, 1991.

Hayles, N. Katherine. *How we became posthuman: Virtual bodies in cybernetics, literature, and informatic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

Mackenzie, Adrian. *Transductions: Bodies and machines at speed*. Continuum, 2002.

Massumi, Brian. *Parables for the virtual: Movement, affect, sensati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2.

二、期刊論文

周世俊、王榮陞，〈從擬真到擬人：生成式 AI 如何重塑數位分身技術〉，《電工通訊季刊》2025 第 2 季（2025.06），頁 27-34。

邱正祥，〈林新惠《零觸碰親密》的賽伯格問題〉，《文學新鑰》40 期（2024.12），頁 61-79。

廖朝陽，〈失能、控御與全球風險：《功夫》的後人類表述〉，《中外文學》36 卷 1 期（2007.03），頁 19-66。

Haraway, Donna J. "A manifesto for cyborgs: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alist feminism in the 1980s." *Socialist Review*, no. 80, 1985, pp. 65-108.

Kessous, Loic. et al. “Multimodal Emotion Recognition in Speech-Based Interaction Using Facial Expression, Body Gesture and Acoustic Analysis.” *Journal on Multimodal User Interfaces*, vol. 3, no. 1-2, 2010, pp. 3-48. <https://doi.org/10.1007/s12193-009-0025-5>.

Sun, Fuze. et al. “Integrating emotional intelligence, memory architecture, and gestures to achieve empathetic humanoid robot interaction in an educational setting.” *Frontiers in Robotics and AI*, no. 12, 2025. <https://doi.org/10.3389/frobt.2025.1635419>.

